

沙丘遺址發掘研究的問題和建議兼談 南丫島大灣遺址的「牙璋」時代問題

徐恒彬

八十年代以來，在環珠江口的深圳、香港、珠海、澳門等地發現了不少沙丘遺址。在發掘和研究中取得了顯著成果，但也出現了新的問題和爭論。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圍繞著香港南丫島6號墓出土牙璋問題引起的爭論。筆者雖然沒有機會參加這一發掘，但卻榮幸地聆聽發掘研究者介紹發掘情況和研究成果，從中得到的教益匪淺，同時也產生了不少疑問和想法，願借這次在香港大學舉行「東南亞考古研討會」的機會，一抒己見，就教於諸位先生與同仁。

一 問題之緣起

1990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和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聯合在香港南丫島大灣發掘沙丘遺址，遺址出土的遺物複雜，器物的年代跨度很大，引起海內外學者的熱烈討論和爭議。大灣遺址發掘成果的介紹，最早見於《文物天地》1991年第4期，李果、李秀園的〈南丫島發掘散記〉，其後又收到鄧聰先生寄來的《香港考古之旅》、看到鄧聰先生的專題評介。1991年11月在封開縣舉行紀念黃岩洞遺址發現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又聽區家發先生親自作了介紹。1994年3月，承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寄贈《南中國及鄰近地區文化研究》巨著，得以進一步了解有關論述和爭論的問題。

綜觀以上論述和介紹的意見，主要觀點和論據如下：

(一) 主持發掘的人是有牌照的、取得國家考古發掘領導隊資格，是中山大學的教授，是有水平和可信的。^①

(二) 地層是沒有問題的，地層的劃分「無誤」。第一層是耕土擾亂層，厚約0.11-0.44米，「除出土小量的幾何印紋硬陶片和現代雜物外，並無發現漢代至鴉片戰爭前的文化遺物，杜絕了後世遺物的滲雜。」第二層根據土色土質又分為2a、2b、2c層。2a層厚0.14-0.42米，深0.36-0.78米，只分佈於東部一角(G17全部和F17、G16的一部份)，連接紅壤石小山丘，屬坡積地層，棕黃色泥土密度大，質堅實，只含少量沙質。2b層「是海灣沙堤堆積，黃色細沙土，含土質極少，質地鬆散。厚0.07-0.61米，深0.50-0.88米。2a與2b層基本上沒有上下疊壓關係，只是分佈地不同，其交接處出現一些疊壓現象，只是土石山上的紅壤經受雨水的沖刷向沙堤積聚的結果。疊壓的範圍也很窄，只有0-2.3米。」2a與2b的底部同出幾何印紋硬陶、釉陶和青銅器，遺物基本上相同，其年代不應有太大的差距。」2c層厚達1米左右，是2a、2b層之下的「間歇層」，「是不含文化遺物的」。第三層「是廣東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層」，在間歇層之下，「遺物以夾砂細繩紋陶、白陶盤為特徵。」^②

(三) 「牙璋」在6號墓發現。M6位於IV區的南端G15探方內，東西向，長2.02米，寬0.90米，墓底距地表0.64米。「該探方之耕土擾亂層較厚，M6之開口處在耕土擾亂層內，其南壁被一近代擾亂坑打破到底。」「現墓殘深僅0.10米，墓邊是在發現器物時才刻意尋找出來的。」隨葬器物集中於南部，計有「牙璋」1件，串飾1組18件。除此之外，別無他物。出土

Xu Hengbin : Administrative Officer, Guangdong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Cultural Relics, China
Director, Guangdo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ina

徐恒彬：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時相互疊壓成堆，「牙璋」疊在上面，只有三枚小管珠散在外面。按縛接的「牙璋」的對接關係觀察，「移動不到2厘米，說明保存良好，既未被後人擾亂，也未因沙土鬆軟而移動了原來位置。」因此，認為「M6之底部距離地表僅有0.64米，與該區出土的青銅器、釉陶器和墓群同一層位，埋藏的深度也差不多，估計其年代亦相差不遠。」⁽¹⁾

(四) 鑒於上述理由及依據《南丫島發掘記》和《香港考古之旅》兩文，都把「牙璋」的埋藏年代暫定為戰國至西漢時期⁽⁴⁾，〈大灣「牙璋」之年代與相關問題〉認為「根據芬戴禮30年代發掘資料，大灣遺址以變紋陶為主要特徵的層位，曾出土大量的幾何印紋硬陶、釉陶器和較多的青銅器，也曾出土鐵鏃，其時代晚至西漢有確切的資料實証的⁽⁵⁾。」

從上述的4個方面的觀點和依據，不難看出研究者斷代的根據實際上只有兩個：其一是依大灣沙丘遺址發掘的地層及其出土的器物為斷代根據。「大灣遺址與變紋陶同地層差不多同一深度伴出的器物，有釉陶盒蓋、釉陶羊(或稱犬)以及青銅器之削刀、鏃等。該釉陶盒蓋，蓋面弧圓，圓形立鈕，蓋邊有一條寬凹槽，與廣州西漢前中期墓葬富有時代特徵的器物，在戰國和西漢後期都不見，是廣州漢墓斷代標準器之一。釉陶羊模型在廣州漢墓較常見。始興白石坪密址雖有動物模型出土但該密址的年代不可能早至戰國，有足夠証據是西漢以後的密址。」30年代，英人芬戴禮在大灣，出土三件青銅與鐵製成的箭鏃，「此三件青銅與鐵製成的箭鏃是與變紋陶伴出，與繩紋陶、釉陶豆、石英杯、青銅戈、青銅匕首、石刀等同一文化，同一時代」。「大灣出土的鐵鏃銅鏃的鏃部亦呈圓條形，與廣州西漢前期墓1073號所出相同，其年代亦應相當，與釉陶盒蓋和釉陶羊的時代相吻合。」⁽⁶⁾其二是以個人的大膽推論為依據。區家發先生認為「關於變紋陶的年代問題，廣東的學者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西

周至春秋，另一種意見則為春秋至戰國早期。但這兩種意見都沒有確切的地層證據。筆者認為幾何紋陶的變紋陶是土著越人的富有特徵性的文化，延續時間長，「其下限年代不會早於西漢。」⁽⁷⁾不難看出，區家發先生是以大灣遺址的地層及其遺物證明自己的觀點，又反過來用自己的觀點來證明大灣遺物，這種互相為證的研究是值得商榷的。

二 問題之根據

問題產生於大灣遺址的地層及其出土遺物和區家發先生的推論。因此探索問題的根源也應該從兩方面去找。

從區家發先生〈大灣「牙璋」之年代與相關問題〉和〈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發掘簡報〉中所介紹的地層和墓葬情況看，不是沒有問題，而是有問題須要深入研究和論討的。

首先，大家都承認第一層為耕土和現代擾亂層，說明遺址存在曾受現代人為擾亂的可能性。

其次，從介紹中看第二層存在不少問題。其中2a層為「棕黃色粘土，密度大，黏性重，質堅實，含少許沙質。」與沙丘遺址以沙為主的地層明顯不一致，因此在〈簡報〉中已着意到2a層是「連接紅壤土石小山丘，屬坡積地層。」⁽⁸⁾既然是由自然的因素或人為因素而形成的坡積地層堆積，這層堆中所包含和出土的遺物，理應不能作為正規的原生文化層及其包含遺物對待，更不應以這種坡積地層為依據，否定長期形成的有根有據的資料和研究成果。2b層是「明黃色細砂土，是海灣沙堤堆積，含土質極少，質地鬆散」，與2a層明顯不一樣，「基本上沒有疊壓關係，其交接處出現一些疊壓現象，只是土石山上的紅壤受沖刷向沙堤積聚的結果」。不難看出，作為海灣沙堤的2b層，前面要受海風、海浪的沖擊，後面要受山坡雨水的沖刷積聚，這對沙堤堆積中的文化層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也不能說不存在問題。2b層受到自然力的干擾對遺物、墓葬的影響，須要進一步調查和研究。

2b層下的2c間歇層告訴我們，確實有一段時間海水及其浪潮影響到這裡，形成了這層「純黃沙土」的「間歇層」堆積。所謂「間歇層」不應指自然力製造沙堤堆積的「間歇」，而是指無文化遺物的「間歇」。當時的先民因為自然的或人為的原因，沒有在這層堆積的時期來這裡活動，因此，也不可能留下任何遺物。(見附表：大灣遺址地層表)

再次，墓葬與地層的關係不清楚。報告者認為共有10座墓葬，「大部份發現於IV區2b層，僅M9位於2a層。由於該遺址堆積為屬純沙質，且受後期農田破壞和水澤浸淫，除M6外，均未發現明顯的墓坑，也無葬具和人骨架。在清理時，將近底部始發現坑內之黃褐色沙土與四周之明黃色沙土略有不同，且出土器物較集中，並有一定的組合規律，因此確定為墓葬」。¹⁰確定墓葬的主要依據為一堆堆的器物 and 坑內沙土的純淺顏色差別，這種依據本身顯然不足。就以M6來看，所在的G15探方「耕土層擾亂較厚，M6之開口處在耕土擾亂層內，其南壁被一近代擾亂坑打破到底(該擾亂坑口無古物發現，只見小量現代垃圾)。現墓殘深僅0.10米，墓邊是在發現器物時才刻意找尋出來的。」¹¹顯然發掘報告者認為存在問題。

根據地層學的原理和發掘規程的要求，要弄清墓葬和地層誰打破或者誰疊壓誰的關係。墓葬和文化層是獨立的地層單位，不是歸屬和包容關係，是早晚的關係。凡是發掘過沙丘遺址的人都容易理解，鬆散單一的沙質層要把墓邊搞清楚確非易事。既然墓邊無法搞清，M6以又是「發現器物時才刻意找尋出來的」，「墓葬開口因農耕平整地破壞過甚已不明」¹²，把墓葬確定為與第二層的2a、2b文化層同時代就失去了根據。把沒有搞清的問題當作確鑿的論據去大膽推論和多方面的否定，走的越遠，造成的謬誤會越多。

關於區家發先生的推論問題也有商討的必要。區先生極力主張以變紋陶為主要特徵的幾何印紋陶文化層「其時代晚至戰國至西漢」，如果確實有根有據，令人信服，應舉

手贊成。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為了證明這一推論觀點，用了不少不足為據的材料。南丫島大灣的發現確實重要，令人敬佩和振奮，然而整理研究的科學態度和觀點，又不能不令人失望和遺憾。綜合各方面的情況看，大灣遺址的墓葬應早於2a、2b文化層，從隨葬器物的分析並不難看出，是屬於變紋陶為主要特徵的文化層之前的墓葬。陶器是最好的斷代器物之一，10座墓葬中有5座出土陶器：M1出土夾砂陶繩紋釜、夾砂陶繩紋罐、泥質陶方格紋凹底罐、泥質陶高圈足豆各1件；M2出土夾砂陶繩紋釜1件；M5出土夾砂陶繩紋釜、夾砂陶器座各1件；M7出土夾砂陶繩紋釜2件、泥質陶凹底罐1件；M9出土夾砂陶繩紋碗1件、夾砂陶繩紋釜3件、泥質陶折唇圓底盆1件、泥質陶圈足弦豆5件。¹³從對墓葬出土部份器物的介紹和圖觀察，這些陶器與廣東淇澳島東澳灣、東莞村頭、佛山河宕、南海灶崗、高要茅崗、曲江石峽遺址中層的同類器物在器型、紋飾和製法方面有不少相似之處。為了證明某種觀點，把早於2a、2b層的墓葬，硬攪在一起，說成是同時代文化層，這不能令人信服的。區家發先生用以支撐大灣遺址2a、2b文化層斷代的釉陶盒蓋和釉陶羊也不是像區家發先生說的那樣「釉陶盒是廣州漢墓斷代標準器之一」。¹⁴我們再認真翻查一下《廣州漢墓》中有關的部份，發現出入很大。西漢墓葬隨葬的陶器、釉陶佔有一定的比例，「施釉和陶器佔全部出土陶器的41%左右，有三十四種器形。釉色黃綠、黃褐，也有近黑褐色的，釉層厚薄不勻。」¹⁵「施釉方法因器型而異，大概可以歸納為蘸釉和刷釉兩種」，「刷釉常見於壺、鈚、甌、小瓶、各種小盒等器型中，釉只刷在器蓋及肩腹部位，口沿為器蓋遮擋，及器腹近底處都不著釉。刷釉的陶器釉層薄而較勻，保存亦較好一些。」¹⁶西漢前期的這種釉陶盒及蓋，與南丫島大灣2a層出土的「釉大部份已脫落」的「青綠色」釉的盒蓋比較，雖然型制有些相像，但不是同一種類的「釉陶」，不能先定為相同而以為依據斷定為西漢前期的器物。至於「釉陶羊」出入就更大，遍查《廣州漢墓》在西漢前中期墓葬中都找不到隨葬陶羊的，到西漢後期墓葬才有豬、狗、

牛、雞、鴨模型隨葬。西漢後期墓葬出土的陶狗有三件，胎質鬆軟，分別為紅黃色和紅色。¹¹⁶與南丫島2b出土的釉陶羊，「既像羊又像犬，身飾篋點紋，喉部有青釉滴」完全不同。¹¹⁶其實，南丫島大灣遺址出土的釉陶羊和採集的折腹陶豆在廣東博羅縣圓洲梅花墩清理發掘的燒造變紋陶器的長條形龍窰中已有出土，同時出土的還有一批牛、狗、鹿、雞等的動物模型器。在曲江石峽上文化層等遺址，都出土過釉陶器和青瓷陶豆等器物。這是春秋時期廣東比較普遍流行的器物，與漢代的同類器物明顯不同，不能混為一談。¹¹⁷由此可見，把南丫島大灣遺址以變紋陶為主要特徵的文化層，硬向下拉到西漢的斷代依據是站立不住的，因此而確定的墓葬及其「牙璋」等出土器物的年代也是不能成立的。至於廣州西漢前期墓出土的6件銅鐵鐵錐，「錐已殘碎如粉狀，鐵錐圓條形」，¹¹⁸與1930年芬戴禮在大灣E探方發現的3件鐵錐銅鐵實難比較，怎麼能談得上「其年代亦應相當，與釉陶盒蓋和釉陶羊時代的吻合。」¹¹⁹關於「牙璋」的論述已經很多，討論的已相當透徹，在此不再贅述，我只想補充一點：「牙璋」在廣東已非首次發現，在東莞虎門村頭遺址出土有「石牙璋」，增城紅花林及粵東地區也曾調查採集過「石牙璋」等器物(圖一)，時代依據共存器物等判斷為青銅器時代早期和中期。村頭遺址第三層的年代在距今3500年左右。其它粵東採集者多與變紋陶共處，同時採集採掘的還有仿青銅器的石戈、石矛等器物，時代不晚於春秋時期。¹²⁰

三 有關研究的建議

珠江三角洲及其延伸的港澳地區已發現的沙丘遺址有上百處之多。從遺址的分類觀察，珠江三角洲的中部以北，以貝丘遺址為主；珠江三角洲的南部濱海地區，以沙丘遺址為主。沙丘遺址大量存在，沙丘遺址是研究濱海地區古文化的主要依據。因此，我們應該重視沙丘遺址的調查、發掘和研究。令人可喜的是近幾年香港和廣東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分別和聯合召開多次學術研討會交流各自的成果和意見。從存在的問題和分歧意見看，這類的交流和研討有必要繼續加強。

為了進一步探討沙丘遺址存在和出現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供專家學者和有關機構參考：

- (一) 沙丘遺址主要分佈於珠江三角洲前緣，海濱和海島周圍，在深圳、香港、澳門、珠海、斗門、中山等地的山丘、島洲的沙堤及其山丘、島嶼的邊緣、廣泛分佈。這種分佈狀況反映了沙丘遺址所在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早期為「海島環境，周圍皆為海域。現今的山灣就是過去的島洲，是當時先民捕魚和棲息的良好地方」。¹²¹由於這樣的特殊自然地理環境條件，研究沙丘遺址多注意一般氣候變化、海陸變遷、海平面變化、環境演變等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離開這方面的配合研究，沙丘遺址的很多問題不但無法弄清，而且會造成混亂。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大家關注普遍性的變化，即冰後期的海浸(在華南沿海稱為「禮樂海浸」)，時代為距今11,000-7,000年，海浸的最高期其海面約比現在高3.7米。「在這次海浸之後接著一次海退，大約在距今6000年，基本穩定在今海面位置上。」¹²²許多研究沙丘遺址的文章多強調「基本穩定」的一面，從大的方面看這是對的，但是具體來分析，情況是複雜的。沙丘是由風、海的作用形成的。1974年筆者去西沙群島考察，看到在颱風和巨浪的作用下，幾天之後就出現一個新的沙灘。香港的沙丘主要是海浸、潮汐和颱風巨浪沖擊作用而形成的。南丫島是個只有面積13.5平方公里的小島，四面環海，考慮這些自然因素對沙丘遺址造成的破壞和影響，把自然擾亂的沙丘和地層當成沒有變動的歷史遺存，必然會引起發掘和研究推論方面的失誤。建議在沙丘遺址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工作中，首先必須把自然因素的侵擾和影響弄清，為考古研究奠定科學的基礎。香港考古學會在南丫島深灣遺址進行的發掘研究給我們開了一個好頭。¹²³

(二) 鑒於沙丘遺址易於受海浸、台風、潮汐和巨浪的傷害、侵擾和影響，編年序列應以大陸遺址的發掘研究為基礎；逐步向沿海、島嶼延伸，這樣的研究基礎入會接近歷史實際和較為科學。因此，有的學者建議先在沙堤後邊的穩定地區進行發掘研究，避免和減少沙丘遺址地層薄，受自然擾亂等可能造成的混亂。還有的學者認為在使用沿海沙丘遺址調查發掘的材料方面，一定要謹慎，應該用大陸遺址的研究成果考證沙丘遺址，不可輕易用沙丘遺址無法搞清的地層及其出土遺物來否定或推翻大陸遺址發掘研究的成果，否則就會本末倒置。一下子弄不清的東西，最好客觀介紹，留給後人去解決。

(三) 香港是一個由半島和島嶼組成的地區，在考古發掘研究方面受自然和歷史的制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香港有現代科學技術、科研人才、信息資料和經濟實力等方面的優勢，這些正是大陸所需要和薄弱的地方。要搞清香港古代歷史、考古方面的問題，把廣東的歷史考古方面的問題，盡可能搞清是重要的前提。因此，加強粵港兩地的合作是解決問題的重要途徑。近十多年來，特別是近五年，雙方有新的發展，取得不少成效。筆者認為今後仍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特別是深入調查、發掘和討論一些課題，從目前情況考慮，進行一些專題考查研究和小型專題研討會更好。

註釋

- (1) 1991年11月在「紀念封閉黃岩洞遺址發現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區家發先生報告之語。
- (2) 區家發：〈大灣「牙璋」之年代與相關問題〉，《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慶祝鄭德坤教授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年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

- (3) 同(2)。
- (4) 同(2)。
- (5) 同(2)。
- (6) 同(2)。
- (7) 同(2)。
- (8) 同(2)，見區家發、馮永耀、李果、鄧聰、喬志禪：〈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發掘簡報〉。
- (9) 同(8)。
- (10) 同(2)。
- (11) 同(8)。
- (12) 同(8)。
- (13) 同(2)。
- (14) 《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北京，頁81、82及103。
- (15) 同(14)，頁285。
- (16) 同(8)。
- (17) 同(2)，楊式挺〈淺說粵港「牙璋」及相關器物—夏商周文化南傳蹟象探微〉，朱非素：〈江三角洲貝丘、沙丘遺址和聚落形態〉
- (18) 同(14)。
- (19) 同(2)。
- (20) 同(17)。
- (21) 李平日、喬彭年、鄭洪江、方國祥、黃光慶：《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

變》，海洋出版社，1991年，北京，頁84。

三十周年論文集》，廣東旅游出版社，1991年，頁215。

(22) 李果、周大鳴：〈香港沙丘遺址的文化生態學考察〉，《紀念黃岩洞遺址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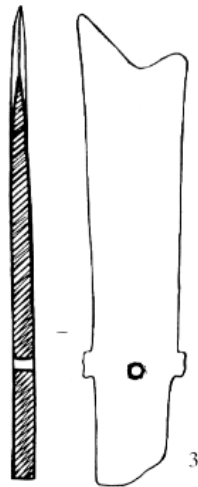
(23) 《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香港考古學專刊第三本，1978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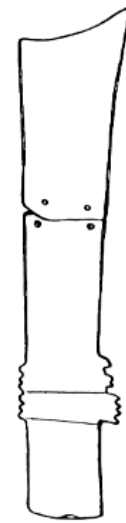
1



2



3



4

「牙璋」：1、2廣東東莞虎門頭貝丘遺址石牙璋(T1006(4)、T0811(3)) 3廣東增城紅花林(1/2) 4大灣遺址牙璋
Yezhang found from (1-3) Guangdong and (4) Hong Kong

層位	綽度(米)	厚度(米)	土質	出土遺物	
第一層	0.11-0.44	0.11-0.44	灰褐色沙質土，為耕土層和現代擾亂層。		
第二層	2a層	0.36-0.78	0.14-0.48	棕黃色泥土，密度大，黏性重，質堅實，含少許沙質。只分佈於東部一角，連接紅壤土石小山丘，屬坡積地層。	青銅器、玉石器和陶器。陶器以繩紋夾砂粗陶為主，還有泥質和幾何印紋硬陶及青釉盒。
	2b層	0.50-0.88	0.07-0.61	明黃色細砂土，是海灣沙堤堆積，含土質極少，質地鬆散。	青銅器、玉石器和陶器。陶器以繩紋夾砂粗陶為主，還有泥質陶和幾何印紋硬陶及青釉羊。
	2c層	?	?	第三區C10探方對應IV區2b層以下，尚有數層，沙土堆積。為間歇層，純黃沙土。	無遺物
第三層	一層		0.25-0.60	明黃色，細砂質土，內含鐵錳紅斑團塊，約佔20%。	細繩紋夾砂陶片、劃紋泥質陶片和彩陶片。
	二層		0.42-0.45	明褐色，細砂土，內含鐵錳紅斑團塊，約佔70%。	僅於層面發現少量細紋夾砂陶片。
	三層	2.47-2.89	0.42	明褐色，細砂土。	無文物發現。
	四層	2.87		明褐色，細砂土。	無文物發現。

附表：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地層表

說明：表中第三層簡稱為：「2c層以下的第一層」、「其下一層」、「再下一層」、「最後一層」。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Related to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Sandbar Sites, and Discussion on the Dating of the Stone *Yazhang* Unearthed from Tai Wan, Lamma Island

Xu Hengbin

[Abstract]

During the last decade, over a hundred sandbar sit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long and off the shores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The finds have thrown light on a number of stud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evoked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debates, of which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 centred around the dating of the stone *yazhang* uncovered from Tomb 6 in Tai Wan, Lamma Island.

The writ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ating methods are to be doubted. Some scholars have dated the *yazhang* by way of relative chronology with reference to stratigraphy withou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Stratum 2a is a slope-accumulation and could not be used as a primary cultural layer for dating to be based on; Stratum 2b is made up of deposits from the sea and the backing hills, which might have caused inaccurate dating; Stratum 2c is a weather-worn "intermittent layer" devoid of cultural remains. Since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out what exact disturbance had the entrance and sides of the tomb undergone, it is unwise to conclude that the tomb is contemporaneous with Strata 2a and 2b.

The writer disagrees with the way that some scholars have associated the glazed pottery box and glazed pottery lamp from Tomb 6 with "similar" remains from various Han tombs in inland Guangdong. In fact, they bear little resemblance to each other. Rather, pottery of similar styles have been found amo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relics uncovered from some inland sites including the kiln site at Meihuadun in Guangzhou. Besides, *yazhangs* were also yielded in cultural layers dated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to early Bronze Age in several localities in Guangdong. It is obvious that *yazhang* was a pre-Han product and the one from Tai Wan should be ascribed to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In hope of shedding more light on the study of sandbar sites, the writer suggests that scholars should firstly clarify how badly these sites have been destructed by storms, sea waves and tides. Secondly, they should seek for reliable inland examples of primary cultural layers to act as basis for relative dating. And lastly, China and Hong Kong should work closer together to allow a more effectiv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